

贵州民族出版社



抗战时期
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

何长凤 编著

何长凤 编著

抗战时期
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何长凤编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1
ISBN 978 - 7 - 5412 - 1423 - 3

I. 抗... II. 何... III. ①彭湖 - 生平事迹②股份
有限公司 - 概况 - 贵州省 - 1937 ~ 1945
IV. K825.38②F279.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188 号

抗战时期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

编 著 何长凤
书名题字 陈福桐
责任编辑 黄彩云
封面设计 龙 英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 地 贵阳·中华北路 289 号(邮编:550001)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412 - 1423 - 3/K · 136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 117 号 电话:6300007 邮编:550018



贵州企业公司总经理彭湖



彭湖总经理与夫人范新绶(贵州企业公司建业小学主任)女士合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贵州企业公司大楼

為豆神文學十週紀念作



母忘豆廿！

更母忘九一八！

要爭取民族之生存與光榮
捨而棄國主義斷命無他法
自昔大詩已譏國

何況讀經與佛學

我們需要的是力—實力，

準備準備，用科學的方法！

彭湖手迹

序

钱存浩*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我于1943年至1950年任中国银行贵阳支行襄理、经理等职务，并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委托，代表该行担任该公司及所属自办、合办单位监事会任董、监事职务，参与有关会议。曾于1989年撰写《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史》，先后在《贵州金融货币史论丛》、《抗战时期内迁西南工商企业》发表。

* 钱存浩（原名钱存浩），曾任贵州地方老年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名誉副会长，贵州省钱币学会副会长。现为贵州钱币学会顾问，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时年94岁。

值此《抗战时期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即将出版之际，追忆往事，我认为彭总经理任职期内，有下列几项工作对当时贵州经济的影响很大，是值得后人借鉴、称赞的。

一、引进西方国家集团性质的股份公司组织形式，影响深远。该公司筹备期间，决定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母子公司组织形式，凭借地方政府权力，吸引中央主管部门的经营管理与技术优势，利用地方低廉劳力，依靠国家金融资本，联合地方知名人士共同经营，较好地解决了贫穷落后地区严重缺乏资金与技术管理人才的难题。兼顾了地方、中央、企业等不同性质的经济利益，充分发挥了金融资本兴办地方企业的积极作用，密切了省内企业与金融业的协作关系，有力地开发与利用了贵州的主要经济资源，形成抗战时期后方基地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影响全国。

二、兴办或扩展轻重工业、运输事业，支持抗战。彭总通过自办与合办或投资方式，兴办了烟草、化工、玻璃、火柴、陶瓷、面粉加工、制糖、纺织等一批轻工业企业；同时建立贵阳营业处，投资贵阳中国国货公司，作为各企业单位产品的销售平台，在战时后方日用生活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另与沿海内迁的由李葆和（解放后民建成员，任河南省商业厅副厅长）、李葆善（解放后民建成员，任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弟兄经营的汉口中国煤气车制造厂，以及中国青年协记烟厂和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单位，先后建立了机械、电力、煤矿、水泥等重型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事业，延揽了大批内迁的优秀的企业管理和技术专业人才，充分利用了各合作单位的机器设备和资金力量，从而奠定了战时贵州轻重工业的基础。特别是推广以木炭为主要燃料的木炭汽车运输，大大地支持了抗战后方交通运输事业，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

三、积极发展农业经济作物，改善农民生活。1940年与贵州

省农业改进所合作,试种美国烟叶成功,随后大力推广烤烟种植面积,开拓卷烟加工原料来源,创造了发展贵州烟草行业的良好条件。同年4、8、9月又先后与定番(今惠水)县政府合作,无偿拨付法币3万元;另以低息贷款法币8万元与遵义县政府合作,作为推广小麦、棉花、油料作物的专款之用。为发展地方农业经济,开拓食品加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生产基地,作出贡献。此外还投资贵阳市合作金库,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各项农业贷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重视调查研究,提倡地方职业教育。该公司成立之初,就成立了经济研究室(又名专员室),聘用中共地下党员王新元(解放后任轻工部副部长)、叶绍南(又名孙大光,改革开放后任地质部部长)等为专员,承担专题研究任务,撰写专题报告,成为该公司制订决策方案的重要依据。邀请地质学专家乐森坪(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主持探测贵州矿产资源,查勘汞、铝、铁、煤等主要矿产品的品质、藏量与分布概况。聘请水文专家刘夫安主持研究工作,获得黄果树大瀑布水源和修文县猫跳河水力发电的数据,为贵州省修建第一座猫跳河水电站,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先后出版发行《企光》月刊、《贵州企业季刊》。其中,彭总亲自撰写了多篇学术论著。又曾团结实业界、金融界人士组织西南实业协会,提倡学术研究,交流经营管理经验。还经常邀请省外著名专家、学者如黄炎培、章乃器、谷春帆教授等座谈,听取各方意见,扩大宣传影响。

1940年10月,该公司委托大夏大学开办高级职业训练班,提供经费法币5000元,侧重培养财会人员;与贵阳市政府合办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特别注意招收黔籍学生,培育经营管理的地方专业人才;多次捐助私立清华中学教育基金,彭总是该校校董之一。

遗憾的是，自 1943 年冬以后，湘、桂战局失利，国内通货日益膨胀，货币贬值加剧。特别是 1944 年日军进袭黔南一带，该公司被迫撤离，不久战局稳定，又复回迁，往返周折，损失甚巨。抗战胜利临近，股东银行投放公司资金力量大为削弱，该公司原有计划兴建的纺织厂、威宁羊毛试验场等项目未能实现。

我与长凤教授相识已久，他在大学攻读历史专业，为人朴实，潜心向学，治学严谨，长期从事贵州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根基雄厚，精心著述，先后主编《贵州近代史》、《贵州当代史》，久负盛名。近年侧重研究民国时期贵州经济的兴衰演变，探索贵州经济的发展规律，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又复先后出版了《贵阳文通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学术专著，在全国学术界、出版界，反响强烈。

我对长凤教授实事求是，踏实无华，孜孜求索，积极搜集历史资料，认真阅读研究的精神，深为钦佩！最近他为突出研究彭湖先生的卓识远见和在贵州企业公司任内的工作经验，出版《抗战时期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一书。该书资料翔实，内容极为丰富，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来之不易，是非常珍贵的、全面系统的重要历史著述和文献。本书不仅开创了研究近现代企业家成败得失的先例，更是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掌门人的有益借鉴，特为之作序。

2006 年 12 月于贵阳寓所

目 录

一、从长沙到贵阳参加筹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
二、以董事身份应聘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1)
三、加强对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21)
四、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蓬勃发展情况	(35)
五、战时“省单位企业”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50)
六、以公司同仁总会为中心开展“合作精神”教育	(62)
七、中国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	(76)
八、离筑时对贵州经济和企业公司今后发展的企及	(89)
附录一：论文、报告选编	(98)
本公司事业概况	(98)
一年来之贵州企业公司	(102)
在招待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席上的讲话	(118)
贵州企业公司两年来业务概述	(121)

论省单位企业	(128)
木炭代油事业之回顾与前瞻	(133)
工程师与企业者	(138)
当前工业资金问题展望	(140)
贵州企业公司三年业务报告	(146)
企业经营与经济建设	(163)
利用外资的基本问题	(172)
今日之贵州企业公司	(180)
我国工业化的决策与准备	(202)
贵企五年综述	(211)
贵企业务近况与战后方针	(252)
贵州之实业问题	(269)
附录二：论文、报告未选目录	(277)
编后	(278)

一、从长沙到贵阳参加筹建 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37年(民国26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北平(北京)西南宛平县芦沟桥中国驻军发起猖狂进攻,中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开枪抵抗还击,全国人民的全面抗战至此开始。这时的日本侵华军队,凭借暂时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先后攻占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继东北之后,华北大片国土沦陷,人民遭受蹂躏。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发动更为猖狂的进攻,先后攻占了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华东广大富庶地区落入敌手。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战斗也十分激烈,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同抗日。为保存实力,坚持抗战,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四川重庆,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巩固后方,坚持长期抗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为目的。

这时沿海沿江一大批工厂、机关、学校、银行、商店,以及一大批爱国的专家、学者、教授、企业家、工程师、银行家等杰出人才,带着知识、技术、资金、设备和经验,也纷纷迁到大西南后方。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的大中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落脚在西南中心的贵州各地。贵州出现了近代以来未

曾有过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

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作为陪都重庆南大门的贵阳,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顿时彰显。贵州在逢着发展大好时机的同时,也承担着发展后方经济、支援前线的重任。于是,如何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如何使用好这些资金、技术、人才,成了当时一切有识之士所思考的焦点。从中央国民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社会名流到各界人士,都十分重视贵州的建设和发展,都在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好这难得的机遇,着力于贵州的开发建设。这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组贵州省政府,派银行家、实业家吴鼎昌出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主持贵州省的行政事务。吴鼎昌的上任,使其成为了抗战时期全国各省地方长官中惟一的文官。

吴鼎昌根据重庆国民政府关于稳定贵州,发展经济,促进西南经济发展,支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意图和重任,在中央财政经济、人才物资、技术设备向贵州倾斜的情况下,制定并执行了以开发贵州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经济建设,促进西南经济发展,巩固后方,支持、保卫重庆国民政府,进行长期抗战的方针政策。

以办银行起家,自称“谈经济而从事实业者二十余年”^①的吴鼎昌来到贵州后,抓住抗战以来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搬迁到贵州省的112家工厂企业单位的资金设备;一批企业家、工程师、技师在内的3 800多名职工队伍;49家中央、各省市公私银行,近数亿元的资金;以及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在内的10多所国立和地方大学近100个专业,400多名教授、副教授、讲师,20 000多名大中学生出现在贵州的机会。在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国家银行等单位的支持下,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开发贵州资源,发展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兴办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全面发展,以支持抗日战

争。贵州省政府先后同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央银行等单位合作,建立了贵州锑业管理分处、农田贷款委员会、生产贷款委员会、桐油运销委员会、农矿工商调整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共同创办了贵州省农业改进所、贵阳电厂、贵州矿务局、贵州油脂厂、贵州丝织公司、梵净山金厂、筑东煤矿公司、贵州印刷所、贵阳建筑公司等厂矿事业单位。还拟办面粉厂、纸烟厂、酿制厂、油漆厂、机器铁工厂、锑铝厂、制革厂、陶瓷厂、化学日用品制造厂、信托运输保险公司、煤矿公司、水泥厂、棉麻厂、纺织厂、制糖厂等。^②

在创办经营这些厂矿企业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在华东有“实业巨子”之称的吴鼎昌,酸甜苦辣的感受很多且很深长,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不少且很深刻。他说:“以上各项企业,是由官商合办,还是由省政府与中央合办,颇费考虑。原因是这些事业都需要长时间的策划经营,才能收效。而政府人事变动无常,继续性小,每每不能一贯。所以需要一个不受政府人事变动影响的商业机关来主持,俾保持一贯的继续性,此所以有本省企业公司之成立。”^③

吴鼎昌在贵州创办企业公司的设想与实践,是想要在战时后方经济建设中,闯出一条省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区域经济建设模式来。他说:“工矿事业,除因性质特殊,必须政府单独举办者外,不宜多归官办,亦不宜概听商办,更不宜官商零乱争办。最好有一官商合办之健全公司,任计划、提倡、统筹之责。得官办之利而无官办之弊,有商办之便宜,而免商办之操纵。予所拟之贵州企业公司办法,似可供各地方之参考。”^④贵州企业公司,实际上担负起了贵州“全省较大规模之工商矿事业兴建”,“负提倡兴起之责,各县地方有力者,亟盼其分担股份,一同参加”。^⑤

吴鼎昌的这一设想是需要有一班子人马的通力合作才会实现

的,贵州企业公司的筹备、创建、发展都依赖着这一班人马的努力而一步步前进。

贵州企业公司的筹备建立工作,早在1938年(民国27年)底1939年(民国28年)初,就在贵州省政府委员中酝酿讨论了。吴鼎昌责成省政府委员,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华北实业界享有盛誉,被他尊称为“师友相兼的长者”,可“随时请益”,“至少可免去许多错误”^⑥的周治春,主持起草《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大纲》、《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章程》、《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业务计划概要》三个重要文件。在1939年(民国28年)3月17日,吴鼎昌主持召开的贵州省政府第521次委员会议上,这三个重要文件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成立以吴鼎昌为主主任委员,包括周治春、何辑五、王激莹、叶纪元、程志颐为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同时决定“将来各银行及个人资本家并重要专家,有参与本公司合作及服务者,拟请其参加筹备委员会”。还责成“周(治春)委员代表本公司与各银行暨资本家接洽时,应说明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暂兼,必要时未尝不可变动;各项章程规定亦可修改;股额亦然”^⑦。表现出了容纳百川,吸收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决心与态度。

在实际进行筹建企业公司的过程中,根据需要,筹备委员会在征得国家有关部门主持人同意后,决定邀请国家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杨公兆、恽震,中国银行的霍宝树、彭湖,交通银行的王志莘,中国农民银行的薛迪锦等6人为贵州企业公司筹备委员会成员。至此,贵州企业公司筹备委员会规格升高,国家经济、金融银行部门的人加入,使得实力财力增厚,人数由6人增加了一倍,达到12人。不久,中国银行重庆总行发出调彭湖离湖南长沙,辞去一切行政工作职务,迅速到贵阳担任贵州企业公司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